

昨夜

长风忆至亲

ZUOYE
CHANGFENG
YIZHIQIN

◎《人物》编辑部 编



书系

RENWU

東方出版社

“西安事变”前张学良与杨虎城的一些交往〔杨拯民〕

不望子成龙——忆我的父亲梁漱溟〔梁培恕〕

记周恩来对岳父于右任的关怀〔屈武〕

俯仰无愧——“文革”中的俞平伯〔韦素〕

儿子记忆中的叶挺将军〔张浩章 王凡〕

忆我的叔父戈公振

玉祥在美国的日子

找自己的梦——顾

K820.7
65

昨夜 长风忆至亲

ZUOYE
CHANGFENG
YIZHIQIN

◎《人物》编辑部 编

 **书系**
RENWU

东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陈佳冉

装帧设计:文渺堂文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昨夜长风忆至亲/《人物》编辑部 编.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9.12(人物书系)

ISBN 978-7-5060-3724-2

I. 昨… II. 人… III. 名人-回忆录-中国-现代 IV. K8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25286 号

昨夜长风忆至亲

ZUOYE CHANGFENG YI ZHIQIN

《人物》编辑部 编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北京市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9年12月第1版 2009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20

字数:320千字 印数:0,001-5,000册

ISBN 978-7-5060-3724-2 定价:35.00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巴斯德说：我们内部有两个人。

一个是理性的。

他要清除一切成见旧说，通过观察、实验和严格推理来了解自然。

一个是情感的。

他为亲人的死亡而哭泣，他无法证明他能够或者不能够和逝者再见。

然而他相信而且期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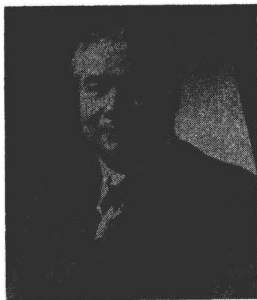
.....

理性和感情是截然不同的领域，两者相牵涉是不幸的。

然而，这种不幸痛苦地延续着我们的生活。

1	冯玉祥在美国的日子里	文/冯理达 罗元铮
12	“怪”教授	文/陈封雄
16	回忆我的叔父戈公振	文/戈宝权
45	怀念我们的父亲顾颉刚	文/顾潮 顾洪
54	八十年的交谊 ——顾颉刚与叶圣陶	文/顾潮
64	不望子成龙 ——忆我的父亲梁漱溟	文/梁培恕
74	怀念先父杨虎城	文/杨拯民
88	“西安事变”前张学良与杨虎城的一些交往	文/杨拯民
94	先父刘文辉那时忆	文/刘元彦
108	落霞与孤鹜齐飞 ——回忆我的父亲张恨水和母亲胡秋霞	文/张正
122	忆友鸾叔与父亲张恨水的交往	文/张伍
132	儿子记忆中的叶挺将军	文/张浩青 王凡
160	先父章乃器往事闻见录	文/章立凡

174	记周恩来对岳父于右任的关怀	文/屈武
188	我的父亲邓散木	文/邓国治
200	丰子恺漫画逸闻	文/丰宛音
205	胡絮青谈老舍	文/王行之
221	忆秀松	文/安志洁
230	俯仰无愧 “文革”中的俞平伯	文/韦素
241	清水出芙蓉 天然去雕饰 ——忆梁思成	文/林洙
262	“其实，我就是一位战士” ——我的父亲臧克家	文/臧小平
272	淡如秋水明如镜 ——回忆我的公公张岱年	文/刘黄
283	长歌一曲谱遗恨 ——回忆我和殷夫的交往	文/盛孰真
294	著名女记者子冈	文/徐城北
308	寻找自己的梦 ——顾城和诗	文/顾工



冯玉祥
1882—1948

冯玉祥在美国的日子里

文/冯理达 罗元铮

1948年9月1日，从美国取道苏联返回祖国，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冯玉祥，在途中不幸罹难。光阴荏苒，转眼间50年过去了。为纪念冯玉祥将军遇难50周年，我们特约冯将军的女儿冯理达将军和女婿罗元铮教授，撰写了这篇纪念文章。

——编者

父亲是直隶（今河北省）青县人。15岁入营当兵，逐级提升至管带。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在滦州举兵响应。中华民国成立后，历任旅长、督军、陆军检阅使等职。1924年发动“北京政变”，驱逐清废

帝，将所部改编为国民军。1926年加入国民党，被推为国民联军总司令，于五原誓师，参加国民革命。1927年与北伐军会师中原。1928年出任行政院副院长兼军政部长。次年举兵反蒋，先后爆发蒋冯战争和中原大战，战败后所部瓦解。“九一八”事变后，积极主张抗日，出任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但遭到蒋介石的排挤，两次隐居泰山读书。抗日战争期间，曾任第三、第六战区司令长官，不久去职，积极参加抗日民主运动。抗战胜利后，竭力阻止蒋介石发动内战。

在父亲66年艰难坎坷的生涯中，最后两年是在美国度过的。他在异国他乡开辟战场，反对蒋介石集团的独裁专制统治，争取祖国的和平民主前途，一直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回想伴随他度过的在美国的那段艰难岁月，至今仍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国民党内的有识之士应该开出革命之花”

1946年9月2日，“美琪将军号”客轮缓缓离开了上海公和祥码头，向大洋彼岸的美国驶去。父亲伫立在甲板上，望着离自己越来越远的多灾多难的祖国，为自己不能阻止蒋介石发动内战而忧心忡忡。自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以来，父亲为制止内战做了各种努力。这不仅没有促使蒋介石悬崖勒马，反而遭其忌恨和排挤。父亲此行是被派为国民政府“考察水利专使”赴美“考察”的。他行前写了《上蒋主席书》，在9月1日的《大公报》上公开发表，再次呼呈蒋介石立即停止内战，实行民主政治，避免生灵涂炭、百姓遭殃。

父亲的偕行人员有母亲李德全、我（冯理达）和5名随员。周恩来和邓颖超在上海为父亲送行，关照父亲的身体和安全，建议设法让留在国内的几个子女赴美留学，以免发生意外，因为蒋介石迫害政敌是不择手段的。父亲听从了这一劝告，后来将儿子洪达和女儿颖达、晓达陆续接到美国。

父亲一行于9月14日抵达美国旧金山，随即在附近的伯克利镇住了下来。他每天学英文，读报，看书，还安排了著书计划。已经是60多岁的老人了，经过一番勤学强记，终于可以看懂英文报纸，进行简单的英语会话了。

父亲虽然身在异国他乡，心里却时刻牵挂着祖国的父老乡亲，关心着国内的政治形势，蒋介石为了进行内战，进一步投靠美国，不惜出卖国家权益，换取美国军援。美军以占领者的姿态在中国土地上横行霸道。12月24

日，美国军人悍然在北京东单强奸一名中国女大学生，导致全国掀起反美斗争的怒潮。伴随内战而来的是特务横行，百业凋敝，物价飞涨，民不聊生。1947年春夏之际，全国爆发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群众运动，上海、北平、天津、南京等地学生先后罢课、游行。5月20日，京沪苏杭地区6000余学生在南京举行挽救教育危机的游行时，在珠江路口遭到军警的镇压，100余人受伤，20余人被捕；天津学生举行反饥饿、反内战游行，也遭军警镇压，50余人受伤，17人被捕，酿成震惊中外的“五二〇”血案。消息传到美国，激怒了父亲。他在旧金山《世界日报》公开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历数蒋介石集团撕毁政协协议，悍然发动内战，压制民主，独裁统治，指使特务滥杀无辜等种种倒行逆施，要求立即成立议和机关，由国民党、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界代表共商和议大计，成立联合政府。这是一篇讨伐蒋介石独裁专制的战斗檄文。父亲抛弃幻想，在美国开辟了反独裁、反内战的新战场。旧金山是美国华侨集中的地区，父亲在这里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工作，发动华侨开展反对美国政府援助蒋介石打内战的宣传活动。

1947年6月30日，人民解放军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随后各路人民解放军逐次转入反攻，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针对国内形势的发展，身在大洋彼岸的父亲，一直同国内的李济深、何香凝等国民党民主派人士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积极团结高层军政人员，结成反蒋统一阵线。1947年夏天，朱学范到伯克利看望父亲。父亲将一封信交给朱学范，请他带回香港、上海，转交宋庆龄、李济深、何香凝。信中写道：

蒋介石控制的国民党已经腐败得不可救药，堕落为人民的敌人，与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完全背离，对它不能抱任何幻想了。国民党内的有识之士应该开出革命之花，建立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是完全必要的。

“民主新伴侣，自由两先锋”

民主和自由是父亲毕生追求的目标，这一点在我俩的婚姻上也有所体现。

1947年9月，父亲应纽约爱国进步人士赖亚力、吴茂荪、王枫等人之邀，赴纽约领导反对美国援蒋的斗争。9月28日，正是中秋节，父亲由母亲和我俩陪同，乘一辆小汽车从伯克利出发了。

我俩于1944年同在成都上大学，在抗日救国宣传活动中相识相恋。父亲来到美国伯克利后，正在美国留学的罗元铮，就承担起父亲的英文秘书兼翻

会后，这个华侨组织立即将父亲的讲演印成传单，夹在每一包衣服里发送，呼吁美国政府不要助长中国内战。

在王昆仑、赖亚力、唐明照、浦寿昌、林达光、吴茂荪等人的协助下，父亲于11月9日在美国创立“旅美中国和平民主同盟”，他被选为主席，罗元铮任秘书。这个组织很快发展了200多个会员，积极开展民主反蒋斗争。父亲以联盟主席名义分别致函美国总统杜鲁门、国务卿马歇尔和美国国会，表明反对美国援助蒋介石、助长中国内战的严正立场。联盟刻印的刊物则以确凿的事实，揭露了美国援蒋的内幕。

当时，李烈钧之子李贻驹在纽约读书。冯李两家是世交，李贻驹经常来拜望父亲。一天，李贻驹对父亲提起：孔祥熙现在也在纽约，对国内局势忧虑不安，对蒋介石的所为亦有怨辞。父亲请李贻驹给孔祥熙捎话，能否安排一个时间晤谈，交换对时局的看法。父亲和孔祥熙的交情，可以追溯到1924年，当时孔祥熙奉孙中山之命，送给父亲6000本《三民主义》和1000本《建国大纲》，两人一见如故。李贻驹将口信捎给孔祥熙，孔祥熙欣然同意会面。于是，罗元铮和李贻驹驱车过了哈德逊河，来到一个僻静的小镇。那里环境优美，镇上的一家餐馆更是幽静典雅，而且是华人罕至之处，于是会面地点就确定在这里。

到了约定的日子，罗元铮驾车送父亲，李贻驹驾车送孔祥熙，来到餐馆会面。两位老友寒暄之后，便谈起国内时局。父亲说：

“蒋介石是不会改弦更张的，美国援蒋的方针也很难改变。我已经公开同蒋介石决裂了，正在写《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一书，以便世人看清他的真面目。”

孔祥熙在谈话中表示了对时局的忧虑和对蒋介石的不满，哀叹“抗战胜利了，其他同盟国都已转入恢复和建设，而中国人却在自相残杀！”

父亲接着说：“蒋介石已不可救药，唯一的办法是在国民党上层、在蒋介石周围组织对抗的力量和行动，如当年张学良、杨虎城双十二在西安那样。”说到这里，父亲问孔祥熙能否参加到这个行动里来，有所作为。孔祥熙同意父亲对时局的剖析，但对自己参加反蒋行动顾虑重重，没有明确表态。最后分手时，孔祥熙表示，这次同父亲晤谈，获益匪浅。

在归途中，父亲对罗元铮说：“孔祥熙以现在的处境和他与蒋介石的关系，不可能有公开的举动，但他的情绪反映了蒋介石的孤立与不得人心。”

此后，父亲更加旗帜鲜明地开展反蒋斗争。11月15日，他在美国《民族报》上发表《我为什么与蒋介石决裂》一文，指出：“蒋介石政权是中国所有腐败政府的顶峰，外国的金钱无法使他免于垮台。美国应该立即停止对蒋介石的一切援助。”他还亲自拜访美国内政部长等政界要员，劝说他们珍惜中美传统友谊，不要支持蒋介石打内战。

父亲知道，美国国会可以干预杜鲁门总统的援蒋政策，于是叫我俩开车送他去华盛顿国会山。他写了《致美国国会议员的公开信》，亲自站在美国国会门口，发送给每个国会议员。12月，美国国会拟通过一项紧急“援华”的议案，拨款委员会调查小组请父亲出席国会听证会。父亲利用这个机会，向国会议员们列举了蒋介石集团独裁专制、大打内战、贪污腐败、滥杀无辜等种种行径，严正指出：“你们不惜大量的金钱做血浆，注进南京政府这具已经奄奄一息的腐烂躯体，希望能出现起死回生的奇迹，这只能是赔了夫人又折兵。”结果拨款委员会将原计划的6000万美元削减为1800万美元。

“革命不是为己为私”

父亲在美国的行动，激怒了南京的蒋介石。12月20日，南京政府宣布撤销父亲“考察水利专使”职务，限令回国。12月30日，父亲在纽约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拒绝服从蒋介石的“限令”，将继续到美国各地讲演，使更多的华人和美国人支持反蒋爱国斗争。在伯克利的母亲写信给父亲：“这一切都证明你在人民心目中的威望更高了，高得使他怕极了！努力吧，光明就在眼前。”父亲回信：“我就等着他通缉了，还有什么呢？”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们要救人民，第一个就是要准备死，第二个就是要准备坐牢，第三是准备被通缉。那不是有什么特别的事，也不是什么意外的事。”

1948年元旦，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成立，父亲被选举为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兼驻美代表。蒋介石则断绝父亲的经济来源，串通美国政府吊销父亲的护照，还开除他的国民党党籍。为此，父亲于1月14日在纽约召开记者招待会，发表声明：

“蒋介石将我开除出他的国民党，这并不使我感到意外。我被控告对党‘不忠’，如果这是指我反对他进行内战和独裁的罪恶政策而言，我就得认罪。但是，忠于蒋介石专制独裁的任何行为，都意味着对中华民族和孙逸仙博士的三民主义的背叛。

自蒋介石20年前篡夺国民党的领导权，并背叛孙逸仙博士的三民主义以来，中国就沦于贪污、腐败与混乱中……抗战胜利后，蒋介石立即发动内战，并强化他的独裁制度。我得出结论，必须像对待清朝、袁世凯和北洋军阀一样，推翻蒋介石的统治，以便在中国能最终实现和平与民主。

我本人为被选入革命委员会的中央而感到荣幸。我保证同国民党内民主派的同志们一起，为推翻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在中国实现和平与民主而奋斗！”

父亲深知蒋介石对待政治对手是不择手段的，随时会对自己下毒手，于是做了最坏的准备。1月23日，父亲给朝夕相处的罗元铮写下长篇赠言。赠言在肯定了罗元铮的诸多长处之后，还提出18条希望，其中有：

革命是为同胞、为国家、为人类谋最大幸福的，不是为自己的，这是人生最高哲学的根本。

“美国有长处，亦有很大的短处；反之，我国有缺点，也有特点。冷静去看，自然明白。

千言万语，真革命党不只是说的，乃是实行的，能刻刻不忘实做实践，日久天长，定能成为一个顶天立地、救世救民的大牺牲者、大革命党人。

这些希望，显然是他自己革命生涯的总结，也是他自己思想情操的升华。他是把它作为精神遗产留给晚辈的。

2月10日，父亲在纽约写下了《亲笔遗嘱》。《亲笔遗嘱》开头写道：

自蒋介石推翻政治协商会议决议案以来，他完全要独裁，要实行希特勒、墨索里尼的办法。在校场口大打，在沧白堂大砸，全是利用流氓、土匪、特务一类的东西，毁灭国家。不但不讲公理，不说是非，并且是倒行逆施。

接着他在回顾了自己的革命历程之后，写道：

我觉得我应当本我推翻满清、打倒洪宪的民主救国精神和勇气，来打倒这个专制魔鬼的希特勒第二的蒋中正，使中国成为真正民有民享民治的民主国。近来和平民主联盟成立，本年一月革命委员会成立，这都是为打倒独裁、成立真的联合政府，好救同胞出此如水益深、如火益热之境地，并不是为己为私，为什么功名富贵。

可是，蒋派出的特务很多。他们一定要用种种卑劣手段对付我。因此我把我的遗嘱预先写好：

不要受蒋的欺骗。”

“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

随着蒋介石在内战战场上的节节失败和国内外反蒋斗争的风起云涌，杜鲁门政府也对蒋介石失去信心，幻想扶植新的代理人。4月9日，一个美国官员到寓所拜访父亲，他对父亲说：

“从中国回来的美国官员和传教士们，及美国政府的报告说，蒋介石贪污成性，中国的民众，多数是痛恨他的，都是盼望冯先生回国去收拾一切。我们美国政府是反对共产党的，是绝不能同共产党合作的。只要你们不要共产党，我们美国政府愿意帮你们的大忙，用钱用军火有的是。”

父亲回答说：

“无论做什么事，天理人情不能不讲。你们说不要共产党，与我们没关系。孙中山手订的三大政策，是我们的标准；中山先生亲笔写的，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这是我们全国同胞的宝典，哪能随便更改。更改了这个，便是叛徒。况且，马歇尔在重庆促成的政治协商会议，共产党的人们是在座的，那是有文献可查考的，不能像喝醉酒一样，说没有那么回事。杜鲁门可以那么说，我们真正革命的党徒，是有主义的，不能随便说话。”

美国官员进一步说：

“给你们6个月的时间，请你们民主人士考虑考虑……我们美国人就是这个意见，只要你们不要共产党，我们就不要蒋介石，愿意帮助你们民主人士。”

父亲当即回答说：

“我们中国，有几千年的文化；不像美国，只有短短的100多年。我们的哲学是：‘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这是说明，全国的人民，工农大众，喜欢什么，我们说什么；喜欢什么，我们做什么。可是没有说过：‘天视自美国人视，天听自美国人听。’美国人喜欢我们说什么，就说什么；美国人喜欢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那确实确实的，不单是三民主义的叛徒，并且是中国的卖国贼。你看我冯玉祥是做这些事的人吗？”

美国官员费了一个半小时的口舌，结果是一无所获。

利诱不成，迫害踵至。美国移民局的官员向父亲发出不能继续居留美国的暗号，我俩和几个弟弟妹妹也相继接到美国移民局的通知，护照即将期

满，不能继续在美国留学。由于南京政府断绝经费，父亲在美生活备感拮据。一天，父亲在纽约寓所画了一幅彩墨梅花，只见苍劲的枝干上，几朵红梅傲雪怒放。罗元铮触景生情，即兴题诗：“几株红梅一老根，流芳四野昼夜芬。不畏风霜不畏寒，坚强好似铁骨筋。”父亲读罢，眼睛湿润了，激动地说：“还是你了解我的心意，这幅画就留给你做纪念吧。”

多行不义必自毙。蒋介石的倒行逆施，加速了南京国民政府的覆灭。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建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父亲立即做出积极反应，决定回国参加新中国的筹建工作。在苏联驻美大使潘友新的帮助下，准备搭乘苏联客轮“胜利号”，经由苏联，返回中国东北的哈尔滨，与李济深、何香凝等人会合。

7月30日，即离美的前一天，父亲在报上发表《告别留美侨胞书》。他最后希望侨胞们和同学们团结起来，将反对美国援蒋的斗争进行到底。

7月31日，父亲在离美的当天，在报上发表《告别美国人士书》。父亲留下了对旅美侨胞和中国人民的感谢、希望，踏上了归国的航程。

原载《人物》1998年第11期

传”罢。

抗日战争以前，陈寅恪是北平清华大学中文系与历史系合聘教授。当时有些学生背地里称他为“怪教授”。他之所以被认为“怪”，是因为学生知道他曾留学欧美十多年，学识渊博，而他的装束却一身“土”气，没有半点洋味：夏季一袭长衫、布裤、布鞋，冬季则一顶“三块瓦”皮帽、长围巾、棉袍再加黑面羊皮马褂、棉裤扎腿带、一双厚棉鞋。戴上近视眼镜，完全是一副只知“子曰”“诗云”的老学究模样。

他的住所离教室有很长一段路，每次去上课，他把要用的书籍讲义用一块方布包好挟在腋下，一颠一颠地低头彳亍而行。因为是近视眼，所以只顾走路，不和别人打招呼。

有一个听过他的课的昔年清华学生曾对我说：“令叔讲课也够怪的，讲白居易的《长恨歌》时，第一句‘汉皇重色思倾国’，为了考证这个‘汉’字，旁征博引就讲了四堂课。低年级的学生往往消受不了。”

1933年，清华大学入学考试的国文试题有“对对子”一项，以“孙行者”三字求对，这就是陈教授出的怪题。这种科举时代的试题，难倒了大部分新式中学的毕业生，有极少数考生对了个“胡适之”，“胡”对“孙”隐喻猢猻，那是最优秀的答案了。事后引起了教育界很大争论，甚至于受到非议。但是寅恪叔认为这是测验学生语文水平的一种好方式，并写文章和别人辩论。这当然也使人觉得他“怪”。

有一天他忽然带我去东安市场的一个茶馆去听说书和京剧清唱。他听得津津有味，使我也觉得他有点怪，因为我一直以为我这位叔父是个除了看书之外没有其他嗜好的书呆子，没想到他还有听说书和清唱的兴趣。

另一件事就是我曾陪他到西单一家西药店去买胃药。当时西药店的药品绝大部分是洋货，店员取出几种胃药，其中有德国货、美国货和日本货，没有中文说明书。他把每个药瓶上的说明以及盒内的说明书都仔细看过，然后选购了一种。店员以为他是精神病患者，我在旁边连忙解释说“他懂各国洋文”，使所有在场的人立即向他投以“奇怪”的眼光。

寅恪叔在我们家里也被认为是怪脾气的人。最怪的一次是“卢沟桥事变”不久，我祖父在北京逝世。几位叔父都主张依习俗请僧众啐经，只有他坚决反对。他说他读过各种佛经，都是骗人的，最后竟未参加有僧道诵经的丧仪而随清华大学师生南下长沙。

国者拿着别有用心的宣言，登门请他签名时，他也是仔细读完，然后婉言拒签。他曾对我说：“我总是先看看已经签名的人有谁，我就大体知道宣言的目的是什么了。”可见他对解放前的政治斗争形势是很清楚的，他的倾向也是很明白的。周总理对寅恪叔很了解，在“十年动乱”初期，曾力阻“红卫兵”批斗寅恪叔，劝他们向“中山大学的陈寅恪先生请教怎样古为今用”，并保证“陈寅恪是爱国者”。

曾任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系主任的吴宓（雨僧）教授在其《空轩诗话》中写道：

始宓于民国八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得识陈寅恪。当时即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驰书国内诸友，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今时阅十五六载，行历三洲，广交当世之士，吾仍坚持此言……

原载《人物》1983年第4期

戈宝权的这篇文章，是他根据长辈亲属们的回忆和他本人亲身所闻所见写成的，为我们提供了不少有关研究戈公振的新史料。

——编者

记得童年时，我的叔父戈公振送了一盒积木给我。他在盒盖的里面，用工整的小楷写着这样两句话：“房子是一块砖头一块砖头造成的，学问是一本书一本书读成的。”不用说，积木早在童年时就散失了，我当时还曾把盒盖珍贵地保存着，后来盒盖也不见了；但他写的这两句话，却长久地铭刻在我的脑海里，而且对我后来的生活、学习和思想，都曾发生过很大的影响。因此当我拿起笔来写回忆他的文字时，这两句话首先就又浮现在我的眼前。

今年的11月27日，是我的叔父诞生的90周年，10月22日是他逝世的45周年。为了纪念他，我想在这篇回忆文字里，谈谈我从长辈们中所听到的，以及我和他在一起生活的日子里所见到的种种情形。

早年的求学生活

首先从我们的家乡和家庭谈起：

我们的家乡东台县，位于江苏省苏北的主要交通航道串场河（运盐河）边。东乡海水河地区，以产盐闻名；西乡甜水河地区，主要是产粮区。由于水网交错，物产丰富，因此也有鱼米之乡的称号。我们的家庭，是县城里的一个所谓“世代书香”的读书人家。我的祖父戈铭烈（字骏叔），是个监生，很受到地方人士的尊敬，他的墓碑还是由我的叔父请孙中山先生题写的。我们家里有不少藏书，记得其中就有邹容的《革命军》，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还有我们童年时最喜欢看的《点石斋画报》。当1911年辛亥革命时，我们家最早表示了响应。我的母亲时常说：“光复那一年，我们家门口最先挂上了白旗！”

在我们家族里，我的叔父属于第十九世（代），以“绍”字排行。我的父亲名绍甲，字曙东，多年来从事教育工作，他是“绍”字辈的老大，大家都叫他“大哥”。我的叔父戈公振，他原名绍发，字春霆，是老二，同辈的人叫他“二哥”。至于我们晚辈的，从小就叫他二叔，用土语叫是“二牙牙”，我想，“牙牙”大概就是对长一辈的尊称“爷爷”的谐音。姑母绍怡，号更生，当过多年小学教员；我们用土话叫她“亮亮”（嬢嬢